

# 中国的佛教建筑

梁思成

## 提 要

这是为信仰佛教的外國讀者寫的一篇簡要歷史敘述，將佛教建築在中國發展的全部過程做了概括性的介紹。

文中首先分析了佛教建築最初開始的歷史和社會根源，然後闡述了兩晉、南北朝時代佛教傳播的社會、政治因素，以及由此而來的寺、塔建築活動的情況；分析了佛教建築對中國古代城市面貌和城市人民生活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並說明即使象寺塔這樣的純粹的精神建築也是脫離不了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條件的。

文章從石窟寺的建築開始，敘述了敦煌、雲崗、龍門、天龍山、响堂山等石窟，分析了它們的印度來源和到了中國以後怎樣創造性地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石窟寺。文中著重指出了這些石窟遺蹟所受到帝國主義文化強盜的掠奪、破壞，並呼喚一切擁有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國家提高警惕。

接着，文章介紹了從晚唐的南禪寺、佛光寺等一直到清代的若干座個別殿、閣和遼、宋、金、元、明、清的若干佛寺組羣，除了在它們的總體布局、結構和藝術手法方面扼要地分析外，還分析了其中有些建築所受到當時政治、經濟和民族因素的影響。

佛塔是作為一個突出的建築類型而加以闡述的。文章敘述了“塔”由印度傳入後如何結合中國原有的高層木結構而創造一個新的類型以及在其後千餘年間的發展，許多新的塔型的產生。由木塔轉變為磚石塔的過程，當時的新材料、新技術對於塔的結構、形式和風格的影響也作了扼要的分析。文章里還追溯了蒙古、西藏、古代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對於佛塔類型和藝術處理上的貢獻。最後以北京靈光寺佛牙塔為例，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的英明、正確。在若干重要建築的敘述中，還特別指出黨和政府對文物建築的關懷、愛護。

文章的結束語著重指出佛教建築，作為我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於新中國的建築的發展，也將有很大的一分貢獻。

## 佛教之传入和最初的佛教建筑

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從印度經過現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而傳入中國的。在大約兩千年的期間，佛教對於中國人民（這裡指的主要是漢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以及物質生活都發生了很的影響。這一切在中國的建築上都有所反映，並且集中地表現在中國的佛教建築上。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化，僅僅按照已經有文字的紀錄來說，就已經有了將

近两千余年的历史。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份，中国建筑的历史实际上比有文字纪录的历史要长若干倍。估计从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可能达到一两万年的长时间，一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匠师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工程结构方面，形成了一套有高度科学性的结构方向；在建筑的艺术处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特殊风格和手法，成为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那就是今天一般被称做中国建筑的这样一个建筑体系。在这些建筑之中，有住宅、宫殿、衙署、作坊、仓库等等，也有为满足各种精神需要的特殊建筑，如中国传统祭祀天地和五谷之神的坛庙，拜祖先的家庙，模拟神仙世界的仙山楼阁，迎接从云端下来的仙人的高台等等。中国的佛教建筑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相传在公元 67 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等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当时的政府把一个官署鸿臚寺，作为他们的招待所。“寺”本是汉朝的一种官署的名称，但是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按照历史记载，当时的中国皇帝下命令为这些天竺高僧特别建造一些房屋，并且以为他们驮着经卷来中国的白马命名，叫做“白马寺”。到今天，凡是到洛阳的善男信女或是游客，没有不到白马寺去看一看这个中国佛教的苗圃的。

公元 200 年前后，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的南京一带），有一个官吏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迴，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见《后汉书·陶谦传》）。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的文献。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巨大的规模，可以容纳三千多人。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个上累金盘的重楼。完全可以肯定，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做的刹；它本身就是印度窣堵波（塔）的缩影或模型。所谓“重楼”，就是在汉朝，例如在司马迁的著名《史记》中所提到的汉武帝建造来迎接神仙的，那种多层的木构高楼。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下，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类型，加上了一些外来的新的因素，就为一个新的要求——佛教服务了。

## 佛教之广泛传播和寺塔之普遍兴建

从笮融建造他的佛寺的时候起，在以后大约四个世纪的期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陷入了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从辽东（今天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蒙古，从新疆，许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部落或民族，纷纷企图侵入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生活比较优裕安定的汉族地区。中国的北部，就是从黄河流域一直到万里长城一带，变成了一个广阔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进行着汉族和各个外围民族的战争，也进行着那些外围民族之间为了争夺汉族的土地和财富的战争；也进行着被压迫的人民对于他们的残暴的不管是本族的或者外族的统治者的反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劳动成果不是被战争完全破坏，就是被外来的征服者或是本民族的残

暴的統治者所掠奪，生活沒有保障。就是在這些統治者之間，在戰爭的威嚇下，他們自己也感到他們的政權，甚至於他們自己的生命，也沒有保障。在苦難中對於統治者心懷不滿的人民也對他們的殘暴的統治者進行反抗。總之，社會秩序是很不安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在困苦絕望中的人民在佛教里找到了安慰。同樣地，當時漢族以及外圍民族的統治者，在他們那種今天是一個勝利者，明天就可能變成一個戰爭俘虜，淪為奴隸的無保障的生活中，也在佛教中看見了一個不僅僅在短短幾十年之間的生命。同時他們還看到佛教的傳播對於他們安定社會秩序的努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廣大人民想望着擺脫苦難的要求下，在統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就在中國傳播起來了。在公元第四世紀，佛教已經傳播到全中國。

在公元400年前後，中國的高僧法顯就到印度去求法，回來寫了著名的《佛國記》。在他的《佛國記》里，他也描寫了一些印度的著名佛像以及著名的寺塔的建築。法顯從印度回到中國之後，對於中國佛教寺院的建築，具體地發生了什麼影響，由於今天已經沒有具體的實物存在，我們不知其詳。不過可以肯定地說是發生了一定的影響的。在這個時期，很多中國皇帝都成為佛教的虔誠信徒。在公元419年，晉朝的一個皇帝，按歷史記載，逆造了一尊十六尺高的青銅鍍金的佛像，由他親自送到瓦棺寺。在第六世紀前半，有一位皇帝就多次把自己的身體施舍在廟里。後來唐朝著名的詩人杜牧，在他的一首詩中就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這樣一個名句。這說明在當時中國的首都建康（今天的南京），佛教建築的活動是十分活躍的。與此同時，統治着中國北方的，由北方下來的鮮卑族拓跋氏皇帝，在他們的首都洛陽，也建造了一千三百個佛寺。其中一個著名的佛塔，永寧寺的塔，一座巨大的木結構，據說有九層高，從地面到剎尖高一千尺，在一百里以外（約五十公里）就可以看見。雖然這種尺寸肯定是誇大了的，不過它的高度也必然是驚人的。我們可以說，像永寧寺塔這樣的木塔，就是笮融的那個“上累金盤，下為重樓”那一種塔所發展到的一個極高的階段。遺憾的是，這種木塔今天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存在。我們要感謝日本人民，在他們的美麗的國土上，還保存下來像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那種類型以及一些相當完整的佛寺組群。日本的這些木塔雖然在年代上略晚幾十年乃至一二百年，但是由於這種塔型是由中國經由朝鮮傳播到日本去的，所以從日本現存的一些飛鳥、白風時代的木塔上，我們多少可以看到中國南北朝時代木塔的形象。此外，在敦煌的壁畫里，在雲崗石窟的浮雕里，以及雲崗少數窟內的支提塔里，也可以看見這些形象。用日本的實物 and 中國這些間接的資料對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初期的佛塔，大概就是這種結構和形象。

在整個佛寺布局和殿堂的結構方面，同樣的，我們也只能從敦煌的壁畫以及少數在日本的文物建築中推測。從這些資料看來，我們可以說，中國佛寺的布局在公元第四第五世紀已經基本上定型了。總的說來，佛寺的布局，基本上是採取了中國傳統世俗建築的院落式布局方法。一般地說，從山門（即寺院外面的正門）起，在一根南北軸線上，每隔一定距離，就布置一座座殿堂，周圍用廊廡以及一些樓閣把它們圍繞起來。這些殿堂的尺寸、規模，一般地是隨同它們的重要性而逐步加強，往往到了第三或第四個殿堂才是廟宇的主要建築——大雄寶殿。大雄寶殿的後面，在規模比較大的寺院里可能還有

些建筑。这些殿堂和周围的廊廡楼阁等就把一座寺院划为层层深入,引人入胜的院落。在最早的佛寺建筑中,佛塔的位置往往是在佛寺的中轴线上的,有时在山门之外,有时在山门以内。但是后来佛塔就大多数不放在中轴线上而建立在佛寺的附近,甚至相当距离的地方。

中国佛寺的这种院落式的布局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除了它一般地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之外,还因为在历史上最初的佛寺就是按照汉朝的官署的布局建造的。我们可以推测,既然用寺这样一个官署的名称改做佛教寺院的名称,那么,在形式上佛教的寺很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汉朝官署的寺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南北朝的历史记载中,除了许多人,从皇帝到一般的老百姓,舍身入寺之外,还有许多贵族官吏和富有的人家,还舍宅为寺,把他们的住宅府第施舍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这样,有很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由许多院落组成的住宅。由于这两个原因,佛寺在它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采取了这种世俗建筑的院落形式,加以发展,而成为中国佛教布局的一个特征。

佛寺的建筑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面貌带来很大的变化。可以想像,在没有佛寺以前,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主要的大型建筑只有皇帝的宫殿,贵族的府第,以及行政衙署。这些建筑对于广大人民都是警衛森严的禁地,在形象上,和广大人民的比较矮小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想象,旧的城市轮廓面貌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有了佛教建筑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除了那些宫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现了巍峨的殿堂,甚至于比宫殿还高得多的佛塔。这些佛教建筑丰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为广大人民可以进去礼佛、焚香,可以在广阔的庭院里休息交际,可以到佛塔上面了望。可以说,尽管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它们却起了后代公共建筑的作用。同时,这些佛寺也起了促进贸易的作用,因为古代中国的佛寺也同古代的希腊神庙、基督教教堂前的广场一样,成了劳动人民交换他们产品和生活用品的市集。另一方面,这些佛教建筑不仅大大丰富了城市的面貌;而且在原野山林之中,我们可以说,佛教建筑丰富了整个中国的风景线。有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都是选择在著名风景区建造起来的。原来美好的风景区,有了这些寺塔,就更加美丽幽雅。它本身除了宣扬佛法之外,同时也吸引了游人特别是许多诗人画家,为无数的诗人画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诗人画家的创作反过来又使这些寺塔在人民的生活中引起了深厚的感情。总的说来,单纯从佛教建筑这一个角度来看,佛教以及它的建筑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巨大的贡献。

## 文献中的早期佛教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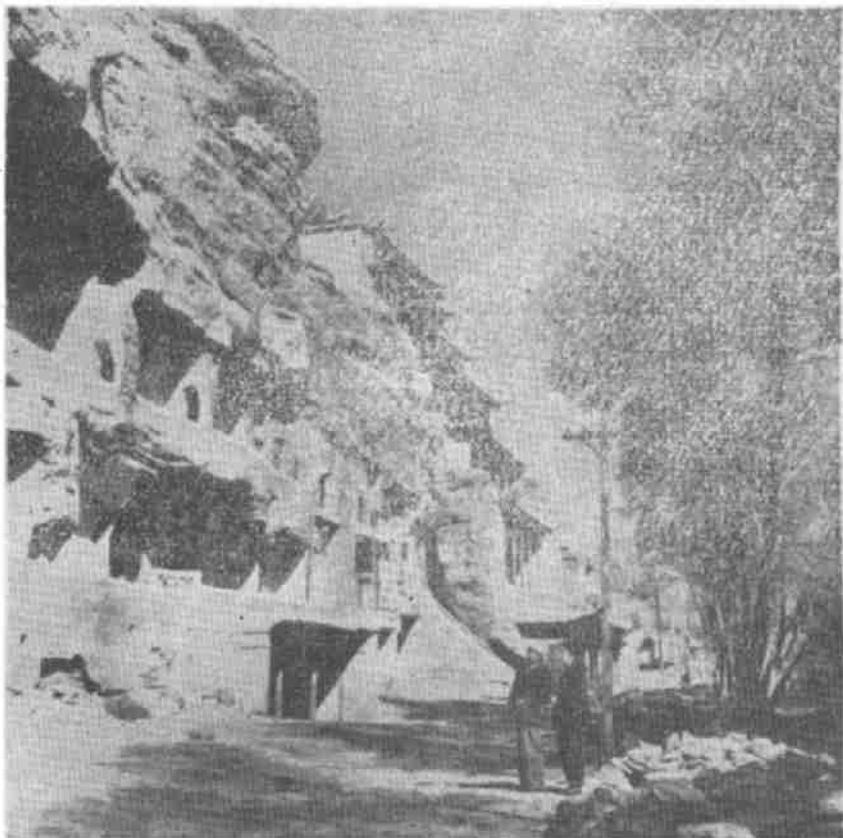
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技术科学上的进步,佛教建筑也同其他建筑一样,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构布局和不同的形式、风格。

从敦煌的壁画里,我们看到,从北魏到唐(从第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五百年间,佛

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說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毕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規模比較大，工料比較好，艺术水平比較高的佛教建筑，大多数是在社会比較安定，經濟力量比較雄厚的时候建造的。佛寺的建造地点，虽然在后代有許多是有意識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但总的看来，佛寺的建筑無論从它的地点來說，

或者是从它的建造規模來說，大多数还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里，或者是沿着貿易交通的孔道上。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阳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长安（今天的西安）城里的一百一十个坊中，每一个坊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佛寺，甚至于有一个佛寺而占用整个一坊的土地的（如大兴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里除造像外大部分都有塔、



第一圖：敦煌千佛崖石窟寺的外景

有壁画。这些壁画和造像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記》里所提到的名画以及著名雕刻，絕大部分是在长安洛阳的佛寺里的。在此以前，例如在号称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阳，也因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楊街之给后代留下了《洛阳伽兰記》这样一本书。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边緣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十九世紀以后的上海相比拟，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样，隔开了也联系了东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由西城到中国来的人越过了沙漠以后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經濟政治的战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寺在敦煌凿造起来。这一切說明尽管宗教建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說，是一种純粹的精神建筑，但是它的发展是脱离

不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条件的。

## 最古的遺物——石窟寺

現在我們設想从西方来的行旅越过了沙漠到了敦煌，从那里开始，我們很快地把中国两千年来的一些主要的佛教史迹游覽一下。

敦煌千佛崖的石窟寺（第一图）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文物。现存的大約六百个石窟是从公元366年开始到公元十三世紀将近一千年的长時間中陸續开凿出来的。其中现存的最古的几个石窟是属于第五世紀的。这些石窟是以印度阿旃陀、加利等石窟为蓝本而模仿建造的。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敦煌千佛崖沒有像印度一些石窟那样坚实的石崖，而是比較松軟的沙卵石冲积层，不可能进行細致的雕刻。因此在建筑方面，在开凿出来的石窟里面和外面，必須加上必要的木結構以及牆壁上的粉刷。牆壁上不能进行浮彫，只能在抹灰的窟壁上画壁画或作少量的泥塑浮彫。因此，敦煌千佛崖的佛像也無例外地是用泥塑的，或者是在开凿出来的粗糙的石胎模上加工塑造的。在这些壁画里，古代的画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当时佛教寺塔的形象，也留下了当时人民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画譜。

其次，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城外的云崗堡，我們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最古的石窟群。在长约一公里的石崖上，北魏的雕刻家們在短短的五十年間（大約从公元450—500年）开凿了大約两打大小不同的石窟和为数甚多的小壁龕。其中最大的一座佛像，由于它的巨大的尺寸，就不得不在外面建造木結構的窟廊。但是，大多数的石窟却采用了在崖內凿出一間間窟室的形式，其中有些分为内外两室；前室的外面就利用山崖的石头刻成窟廊的形式。內室的中部一般多有一个可以繞着行道的塔柱或雕刻着佛像的中心柱。我們可以从云崗的石窟看到印度石窟这一概念到了中国以后，在形式上已經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印度的支提窟平面都是馬蹄形的，內部周围有列柱。但在中国，它的平面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而用丰富的浮彫代替了印度所用的列柱。印度所用的圓形的犍堵波也被方形的中国式的塔所代替。此外，在浮彫上还刻出了許多当时的中国建筑形象，例如当时各种形式的塔、殿、堂、等等。浮彫里所表现的建筑，例如太子出遊四門的城門，就完全是中国式的城門了。乃至佛、菩薩像的衣飾，尽管雕刻家努力使它符合佛經的以及当时印度佛像雕刻的样式，但是不可避免有許多細節是按当时中国的服装来处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窟建筑的处理上，和浮彫描繪的建筑上，我們看到了許多从西方传来的裝飾母題。例如佛像下的須弥座、卷草、哥林斯式的柱头，伊奥尼克的柱头，和希腊的雉尾和箭头極其相似的蓮瓣裝飾，以及那些联珠璣珞等等，都是中国原有的艺术里面未曾看見过的。这許多裝飾母題經過一千多年的吸收、改变、丰富、发展，今天已經完全变成中国的雕飾題材了。

在公元500年前后，北方鮮卑族的拓跋氏統治着半个中国，取得了比較坚固的政治局面，就从山西的大同迁都到河南的洛阳，建立他們的新首都。同时也在洛阳城南的十二公里的伊水边上选择了一片石質坚硬的石灰石山崖，开凿了著名的龍門石窟。我們推測在大同的五十年間，云崗石窟已經成了北魏首都郊外一个不同缺少的部分，在政治上

宗教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洛阳，同样的一个石窟，就必须尽快地开凿出来。洛阳石窟不像云岗石窟那样采用了大量的建筑形式，而着重在佛像雕刻上。尽管如此，龙门石窟的内部还是有不少的建筑艺术处理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以愤怒的心情提到，在著名的宾阳洞里两幅精美绝伦的叫做“帝后礼佛图”的浮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已经被近代的万达尔(Vandals)——美国的文化强盗敲成碎块，运到纽约的都市博物馆里去了。

在河北省磁县的响堂山，也有一组第六世纪的石窟组群。这一组群表现了独特的风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印度建筑形式和中国建筑形式的非常和谐的，但有些也不很和谐的结合。印度的火焰式的门头装饰在这里大量地使用。印度式的束莲柱也是这里所常看见的。山西太原附近的天龙山也属于第六世纪，在石窟的建筑处理上就完全采用了中国木结构的形式。从这些实例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窟这一概念是从印度来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逐渐地它就采取了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但同时也吸收了印度和西方的许多母题和艺术处理手法。佛教的石窟遍布全中国，我们不能在这里细述了。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石窟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令人十分愤慨的一些现象。在云岗、龙门，除了像宾阳洞的“帝后礼佛图”那样整片的浮雕或整座的雕像被盗窃之外，像在天龙山，现在就没有一座佛像存在。这些东西都被帝国主义的文化强盗勾结着中国的反动军阀、官僚、奸商，用各种盗窃欺骗的手段运到他们的富丽堂皇的所谓博物馆里去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盗窃了大量的经卷。云岗、龙门无数的佛头，都被陈列在帝国主义的许多博物馆里。帝国主义文化强盗这种掠夺盗窃行为是必须制止的，是不可饶恕的，是我们每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国家所必须警惕提防的。

## 唐代以来的佛寺组群和殿堂

前面已经说到，中国的佛寺建筑是由若干个殿堂廊廡楼阁等等联合起来组成的，因为每一所佛寺就是一个建筑组群。在这种组群里除了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部分以外，往往还附有僧侣居住和讲经修道的部分。这种完整的组群中，现存的都是比较后期的，一般都是十三、十四世纪以后的。因此，在这以前的木构佛寺，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不完整的，或是经过历代改建的组群。

在中国木结构的佛教建筑中，现在最古的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它是公元782年建成的。虽然规模不大，它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离南禅寺不远的佛光寺大殿(第二图)。它是857年建造的，是一座七间的佛殿，一千一百年来还完整地保存着。佛光寺位置在五台山的西面山坡上，因此这个佛寺的朝向不是用中国传统的朝南的方向，而是向西的。沿着山势，从山门起，一进一进的建筑就着山坡地形逐渐建到山坡上去。大殿就在组群最后也是最高的地点。据历史记载，在第九世纪初在它的地点上，曾经建造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里边有佛、菩萨、天王像七十二尊。但是在公元845年，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宫廷里斗争的结果，道教获胜，当时的皇帝下诏毁坏全国所有的佛教寺院，并且强迫数以几十万计的僧尼还



第二圖：公元 837 年建造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俗。这座弥勒大阁在建成后仅仅三十多年，就在这样一次宗教政治斗争中被毁坏了。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的皇叔，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登位了，立即下诏废除禁止佛教的命令；许多被毁的佛教寺院，又重新建立起来。现存的佛光寺大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的。但是它已经不是一座三层的大阁，而仅仅是一层的佛殿了。这个殿是在当时在长安的一个妇人为了纪念在三十年前被杀掉的一个太监而建造的。这个妇女和太监的名字都写在大殿大梁的下面和大殿面前的一座经幢上。这些历史事实再一次说明宗教建筑也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在这一座建筑中，我们看到了从古代发展下来已经到了艺术上技术上高度成熟的一座木建筑。在这座建筑中，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充分发挥了这个结构部分的高度装饰性而取得了结构与装饰的统一。在内部，所有的大梁都是微微拱起的，中国所称做月梁的形式。这样微微拱起的梁既符合力学荷载的要求，再加上些少的艺术加工，就呈现了极其优美柔和而有力的形式。在这座殿里，同时还保存下来第九世纪中叶的三十九尊佛像、同时期的墨迹以及一小幅的壁画，再加上佛殿建筑的本身，唐朝的四种艺术就集中在这一座佛寺中保存下来。应该说，它是中国建筑遗产中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

遗憾的是，佛光寺的组群已经不是唐朝第九世纪原来的组群了。现在在大殿后还存在着的一座第六或第七世纪的六角小砖塔；大殿的前右方，在山坡较低的地方，还存在着

一座十三世紀的文殊殿。此外，佛光寺仅存的其他少数建筑都是十九世紀以后重建的，都是些規模既小，質量也不高的房屋，都是和尚居住和杂用的房屋。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已經公布佛光寺大殿作为中国古代木建筑中第一个国家保护的重要的文物。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已經对这座大殿进行了妥善的修繕。

按照年代的順序來說，其次最古的木建筑就是北京正东約九十里蓟县的独乐寺。在这个組群里現在还保存着两座建筑；前面是一座結構精巧的山門，山門之內就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观音閣（第三圖）。这两座建筑都是公元984年建筑的。观音閣是一座外表上两层实际上三层的



第三圖：公元984年建造的蓟縣独乐寺观音閣

木結構。它是環繞着一尊高約十六米的十一面观音的泥塑像建造起来的。因此，二层和三层的楼板，中央部分都留出一个空井，讓这尊高大的塑像，由地面层穿过上面两层，树立在当中。这样在第二层，瞻拜者就可以达到观音的下垂的右手的高度；到第三层，他們就可以站在菩薩胸部的高度，抬起头来瞻仰观音菩薩慈祥的面孔和举起的左手，令人感

到这一尊巨像，尽管那样大，可是十分亲切。同时从地面上通过两层的楼井向上看，观音的像又是那样高大雄伟。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匠师在处理瞻拜者和菩薩像的关系上，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

在結構上，这座三层大閣灵巧地运用了中國传统木結構的方法，那就是木材框架結構的方法，把一层层的框架叠架上去。第一层的框架，运用它的斗拱，构成了下层的屋檐，中层的斗拱构成了上层的平座（挑台），上层的斗拱构成了整座建筑的上檐。在結構方法上，基本上就是把佛光寺大殿的框架三层重叠起来。在艺术风格上也保持了唐朝那一种雄厚的风格。

在十八世紀时，这个寺被当时的皇帝用做行宮，作为他长途旅行时休息之用。因此，原来的組群已經经过大規模的改建，所余的只是山門和观音閣两座古建筑了。

在中国現存較古的佛教寺院中，可以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和山西大同善化寺这两个組群中看到一些比較完整的形象。正定隆兴寺是公元971年开始建造的。由最前面的山門

到最后面的大悲閣，原来一共有九座主要建筑。尽管今天其中已經有两座完全坍塌，主要的大悲閣也在严重损坏后，仅将殘存部分重修保留下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但是还能够把原来組群的布局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这个組群中，大悲閣是最主要的建筑，閣內供养一尊巨大的千手观音銅立像。可惜原来环绕着这座銅像的閣本身已經毁坏得很利害。大悲閣的左右兩側各有一楼，楼閣并列，在构图效果上形成了整个組群的最高峯。大悲閣前面庭院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座小楼，其中一座是轉輪藏，整座小楼的設計就是为一个轉輪藏而构成的。到现在为止，这个轉輪藏是中国現存唯一第十世紀的眞正可以轉动的佛經的書架。与大悲閣相对在軸綫上是一个十八世紀建造的戒壇。戒壇的前面有一座平面正方形，每面突出一个抱廈，从而形成了極其优美丰富的屋頂輪廓綫的摩尼殿。这一座殿是十一世紀建造的，是这个組群中除戒壇外年代最晚的一座建筑。摩尼殿前面的大覺六师殿和它前面左右側的鐘樓鼓楼則不幸在不知什么时候毀坏了。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一个比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組群。现在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全部是由公元十一世紀中叶到十二世紀中叶这一个世紀之間建成的。这个組群規模不如正定隆兴寺那样深邃，但是庭院广闊，气魄雄伟，呈現很不相同的气氛。这个組群虽然年代相距不远，但是隆兴寺是在汉族統治之下建造的，而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当时是在东北民族契丹、女眞統治下的。这两个組群所呈現的迥然不同的气氛，一个深邃而比較細致，一个广闊而比較豪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北不同民族的风格。

可以附帶提到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它是原来規模宏大的华严寺組群遺留下来的两座建筑之一，虽然它是其中較小的一座，可是作为一座 1038 年建成的佛教圖書館，它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靠着这座圖書館內部左右和后面牆壁，是一排“U”字形排列的制作精巧的藏經的書櫥壁藏。这个書櫥最下层是須弥座，中层是有門的書櫥主体，上面做成所謂“天宮楼閣”。这个“天宮楼閣”可以說是当时木建筑的一个精美准确的模型。整座壁藏則是中國現存最古的書櫥。

在山西洪赵县的霍山，有两个蒙古統治时代建造的組群广胜寺。这两个組群是一个寺院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叫做上寺，一部分在山下叫做下寺。上寺和下寺由于地形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輪廓綫。上去位置在霍山最南端的尾峯上，利用南北向的山脊作为寺的軸綫。因此軸綫就不是一根直綫而随着山脊略有曲折。在組群的最南端，也就是在山末最南端的一个小山峰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琉璃塔。尽管这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紀建成的，却为十四世紀的整个組群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寺的規模比較小，可以說是上寺的附屬組群。在这两个組群中，結構上大量地采用了蒙古統治时代所常用的圓木作結構，并且用了巨大的斜昂，构成类似近代的桁架的結構。这种結構只在蒙古統治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間，曇花一現地使用过，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沒有看見。广胜寺原来藏有希世的珍本金版的藏經。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經企图搶劫这部藏經。現在人民政府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当时为了保衛这部藏經，曾經率領八路軍部队在寺的附近和日本侵略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胜利地为祖国人民保衛住了这部珍貴的文化遺產。

十四世紀末叶以后，那就是說明、清兩朝的佛寺，現在在中国保存下来的很多，只能

按照不同的地区和当时不同的要求，举几个典型。

首先是所謂敕建的寺院，亦即皇帝下命令所建造的寺院。这种寺院一般地規模都很大，無論在什么地区，大多按照政府規定的規範(亦即北京的規範)設計建造。例如現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在的广济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寺位置在城市中心的热鬧区，占用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还是有完整的层层院落。山門面临热鬧的大街，門內有一个广闊的可以停車馬的前院。这种前院，在一个封建帝国的首都，是貴族和高级官吏、富有的商人等等，特别是他們的眷屬，到寺里烧香礼佛所必需的。而临前院和山門相对的是一座天王殿，殿內有四尊天王像；他們不仅是东西南北四面天的保衛者，并且是寺院的保衛者。在天王殿的前面，在前院的两側是鐘樓和鼓楼。每天按照寺院生活的日程按时鳴鐘击鼓。天王殿的后面，是寺內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他的后面是圓通宝殿。前一座供奉的是三世佛，后一座供奉的是观音菩薩。最后是一座两层的藏經閣。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內著名的佛牙就供奉在这座閣上。从天王殿一直到藏經閣的两旁是一系列的配殿和廊廡，把整个組群环繞起来，同时也把几个院落划分出来。由于地势比較局促，广济寺的庭院虽然不十分广闊，可是仍然开朗幽雅，十分适宜于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在这方面，建筑师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組群的右側，另外还有几个院落，是方丈僧侶居住的地区，現在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所在。这个組群原来是十七世紀建造的，后来曾經部分烧毁，又經修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广济寺又进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重修，面貌已經瀟然一新，成为中国佛教徒活动的主要中心了。

在北京郊外西山的碧云寺是敕建寺院的另一典型。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建筑处理的手法和市区佛寺的处理手法也就很不相同了。碧云寺所在的地点是北京西郊西山的一个风景点。这里有甘冽的泉水，有密茂的柏林，有起伏的山坡，有巉岩的山石。因此，碧云寺的殿堂、廊廡的布局就必须結合地形，并且把这些泉水、岩石、树木組織到它的布局中来。沿着山坡在不同的高度上坐落一座座的殿堂以及不同标高的院落。在这个組群中可以突出地提到三点：一个是田字形的五百罗汉殿，这里边有五百座富有幽默感的罗汉像，把人带进了佛門那种自由自在的境界。罗汉堂的田字形平面部署尽管是一个很規則的平面，可是給人带来了一种迂迴曲折，难以捉摸，无意中会遺漏了一部分，或是不自觉地又会重遊一趟的那一种錯覺。另一个突出点是組群的最高峰，汉白玉砌成金刚宝座塔。从远处望去，在密茂的丛林中，这座屹立的白石塔指出了寺的位置，把远处的遊人或香客引导到山下山門所在，讓人意外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座幽雅的佛寺。关于这座塔，在另一段中将比較詳細地叙述，在这里就不必細談了。另一个突出点，是以泉水为中心的庭圓。在这里有明澈如鏡的放生池，有涓涓流水，在密茂的松柏林下，可以銷除任何人的一身火气，令人进入一个清涼的境界。总的說来，这个組群是在山林优美地区建造佛寺的一个典型。浙江杭州的灵隱寺，以及江西廬山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有相同的效果。

中国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原因，佛寺的建筑就和北方的特别是敕建的佛寺在部署上或是在风格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四川峨嵋山許多著名的寺院，都建

造在坡度相当陡峭的山坡上。在这里气候比较温和而多雨，山上林木茂盛，因此我们见到的一个个沿着山坡一层比一层高，全部用木料建造的佛寺组群。由于天气比较温暖，所以寺庙的建筑就很少用雄厚的砖石墙而大量利用山上的木材作成板壁。院落本身也由于山地陡坡的限制而比较局促。但是，只要走出寺门，就是广阔无边的茂林，或是重叠起伏的山巒，或目极千里的远景，因此寺内局促的感觉也不妨碍着寺作为一个整体的开阔感了。峨嵋山下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在十四世纪末或十五世纪初末，在中国佛寺的建筑中初次出现了发券的砖结构的殿堂，一般被称做无梁殿，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山西五台山的显庆寺，江苏苏州的开元寺、南京的灵谷寺、宝华山等。这种的结构都是用一个纵主券和若干个横券相交，或是用若干个并列的横券而其間用若干次要的纵券相交贯通。这种发券的建筑在西方是很普通的，但在中国，虽然匠师们在建造陵墓和佛塔中已经运用了一千多年的发券，却是到十四、十五世纪之交才这样运用到地面可以居住或使用的结构上来。在外表形式的处理上，当时的工匠用砖模仿木结构的形式，砌出柱梁斗拱、檐椽等等。这种做法本来是砖塔上所常用的，把它用到殿堂上来，可以说又创造了佛教殿堂的一个新的类型。在太原永祚寺，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和东西两配殿构成一个组群。一般说来，这种结构方法还是没有普遍地推广，实物还是比较少的。

有必要叙述一下满族的清朝（1644—1911年）时期中修建的一些喇嘛寺，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等。

喇嘛教是在元朝蒙古统治时期（十三世纪后半和十四世纪）由西藏传入汉族地区的，满清皇朝中，西藏和北京的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西藏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央政权封赐的达赖和班禅的称号。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建筑上反映出来。在北京城的北面修建了东黄寺和西黄寺两个组群。东黄寺是达赖喇嘛到北京时的行宫，西黄寺则是给班禅喇嘛的。可惜在本世纪的前半，在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这两个组群都被破坏无遗了。因此在北京，我们只能举雍和宫为例。

雍和宫是清朝第三代皇帝将他做王子时的王府施舍出来改建的，于1735年完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喇嘛寺。庙前有巨大的广场和三个牌坊，山门以内中轴线上序列着六座主要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用传统的汉族手法建造的。其中法轮殿平面接近正方形，屋顶有三道平行的屋脊。中间的一脊较高，上面中央建一座“亭子”，前后两脊较低，各建两座“亭子”，形成了在下文将要叙述的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而这种塔却是在十五世纪由西藏传到北京的。

组群的最后一进是綏成殿，与左右并列的两阁各以飞桥相连。这种布局是中国建筑中比较罕见的。但其来源并不是西藏而是汉族的古老传统。

雍和宫最高大的建筑物是万福阁，阁内是一尊高达20米弥勒佛像。

河北省承德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建有避暑山庄（离宫）。在避暑山庄的东北的丘陵地带，从1713年至1870年之间陆续建造了十一座大型喇嘛寺组群，其中八处至今还还存在，称为“外八庙”。这些组群都建造在山坡上，背山面水，充分利用了地

形，形成了豐富的輪廓綫。在這些建築中，有模仿新疆維吾爾族形式的，有完全西藏式的，也有以漢族形式為主而帶有西藏風趣的。

上面只舉出了少數突出的著名佛寺組群，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佛教建築僅僅就是這種大型佛寺。事實是，數以萬計的佛寺，可能到十萬以上的大大小小佛寺遍布全中國。大的如上所述，小的只有一個正殿兩個配殿，和一般小住宅差不多。這些無數的佛寺中各有不同的地方風格，其中也有極優秀的作品。從佛寺的數字和分布上看來，也可以看到佛教對於中國人民生活的歷史性影響。但在这里不能詳細敘述了。

## 佛 塔

在中國的佛教建築中，佛塔是值得作為一個特殊的類型而加以闡述的。從晉融建造他的金盤重樓起，在將近兩千年的長期間，凡是規模較大的寺院組群中，往往也包括一座或若干座塔。經過長期的發展，中國歷代的匠師創作出許多不同的塔型，大量佛塔遍布全國，成為一分極其豐富的遺產。

前面已經說到，中國初期的佛塔都是木材建造的；但是由於木材本身容易焚毀，特別是佛塔本身的高度，再加上上面金屬的塔刹，容易誘導落雷，所以木塔的壽命一般都是很短的。再加上香火失慎，或是戰爭的破壞，如何取得佛塔的永久性問題，早已受到古代的高僧信士和工匠們的注意了。

在公元520年，我們看到了對於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答案，那就是河南嵩山嵩嶽寺塔，中國現存最古的一座磚塔（第四圖）。在它以前及和它同時的木塔，平面都是四方形的，並且是一層層地架疊上去的。這座塔却一反傳統形式，平面作十二角形，在一座很高的塔基上，加上一座很高的塔身，再上去就是十四層很密的簷。這種形式是和過去三百年來傳統的木結構形式毫無相似之處的。雖然沒有文獻可證，但是我們可以大膽肯定地說它是模仿印度的一些塔型的。從這座塔上的許多雕飾部分看，例如以蓮瓣為柱頭和柱礎的八角柱，以獅子為主題做成的佛龕，火焰形的券面等，印度的裝飾母題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了一座不怕雷火的永久性的佛塔。雖然在這以前五百年間，磚已經被相當普遍地用在建築上，但是象這座塔這樣全部用磚結構而且達到將近40米的高度，它所反映的不僅是古代匠師在用磚的技術上極大的提高，而且反映磚的生產極大的發展。從這座塔上我們看到社會生活需要和思想意識提出的要求，就向建築提



第四圖：公元520年建造的嵩山嵩嶽寺磚塔

出了新的课题。当生产力和匠师的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可以产生新的方法和形式来满足这种要求。在结构上，这座佛塔由顶到底内部是空的，是象今天我们砌一座烟囱那样砌上去的。内部的楼板和扶梯都是用木头建造的。从这一现象看，说明当时的匠师在技术上还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从艺术方面看，这座砖塔的轮廓线是异常优美流畅的。这条轮廓线正是几何学上的抛物线形。这不仅说明当时的匠师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几何知识，而且在建造过程中能够准确地把它砌出来。从佛塔的发展史看来，嵩山嵩岳寺塔，如同佛光寺大雄宝殿在木结构的殿堂中那样；是一件很珍贵的遗产。

从这个时候起，以后将近五百年的期间是一个木塔和砖塔并存的时期。例如北魏的洛阳、唐的长安，所有数量众多的塔，绝大部分都是木材建造的，但是砖塔的数量比重在这五百年间，就逐渐增加；到了公元第十世纪以后，木塔就成为极其希罕的东西了。

伟大的唐朝（618—906年）给后代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砖塔。在这些砖塔之中，有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象古代的木塔那样一层一层累上去的，我们可以叫这一种做“多层塔”；另一种是象嵩岳寺塔那样，在一个高大的塔身上承托着多层密檐的，我们可以叫这一种做“密檐塔”。此外，还有一种次要的塔型，那就是作为和尚坟墓的单层的墓塔。令人注意的是，所有唐代的塔，除了一个例外，平面全部是正方形的。嵩岳寺塔十二角形的平面，在以后两千年间再也没有再出现了。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四方形的平面是佛塔由诞生到成熟型的发展过程中，广大的善男信女在概念上已经接受了四方形的多层木塔作为塔的标准形式，因此佛塔的平面必须是四方的，否则它就不象一个塔了。而且在塔的表面处理上也必须把木结构的柱梁、斗拱表现出来，因此唐朝的多层砖塔例如西安的大雁塔（公元701—704年）、香积寺塔（681年）、兴教寺玄奘塔（669年）等都属于这个类型。显然，由于砖的材料本身以及用砖技术的限制，斗拱和檐椽部分是大大地简化了。另一类型，密檐塔在唐代也采用正方形的平面。这种塔一般的不用柱梁斗拱等表面装饰，完全以它们的轮廓线取得艺术效果。其中杰出的例子，有嵩山永泰寺和法王寺的两座塔，虽然准确年代无可考，但都是第八世纪的东西。这一塔型在中国相当普遍，远到西南云南的昆明、大理也有唐代的密檐砖塔。例如昆明的慧光寺塔，大理的崇圣寺塔，都是杰出的例子。但是最重要的应该说是西安荐福寺的小雁塔。它和慈恩寺的多层的大雁塔，已经成为西安城市轮廓线的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了。

在唐代诸塔之中，我们应该特别提到慈恩寺的大雁塔。它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从印度回到中国以后，在翻译他由印度带回的经卷的时候，特别建造起来为保存印度带来的梵文原本用的。因此这座塔在中国的佛教史中就有特殊意义。

在所有这些塔中，内部的楼板扶梯也同前一个时代一样，是用木材建造的。显然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到了十世纪以后才得到了解决。在唐代的砌塔中，还有为数众多的高僧墓塔，除了极少数如玄奘塔那样是多层塔以外，全部都是单层正方形的小塔，其中许多是用石料建造的。例如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慧崇塔（第七世纪前半建造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塔一般有两层重檐，顶上有砖或石制的刹，高度一般不超过四或五公尺。但是在唐代墓塔中，有一个孤例，那就是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塔（745年）。它的

平面是八角形的；表面上用磚砌出柱梁斗拱和門窗等。這座單層的小小的八角形磚塔，可以被認為是後來八角塔的始祖。

第十世紀中葉以後，磚塔已經成為絕大多數，木塔已經寥若晨星了。從這時候起，在佛塔的形式上和結構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二百年以前在淨藏塔上一度出現的八角形平面，到這時候，突然變成了佛塔的标准平面形式了。這個平面形式的突然改變，原因何在，中國的佛教史家和建築史家還沒有找着令人滿意的解釋。這一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技術上，五百年來木樓梯、木扶梯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宋朝以後的塔再不是象烟囪那樣砌上去了，而是在塔的內部用各種角度和相互交錯的筒形券的方法，把內部的樓梯、樓板，塔內的龕室等同時砌成一個整體，消滅了過去五百年來外部用磚結構，內部用木結構的缺點。塔身更加堅固了。

第十世紀中葉以後，更發展出豐富多采的佛塔類型；雖然基本上還是以多層塔和密簷塔兩個類型為主，但是不同的地區還創造出不同的地方風格。而且兄弟民族對於塔的類型的創造也有不少貢獻。

在黃河、淮河流域，當時屬於漢族的宋朝統治的地區，主要的是八角形的多層塔。這些塔一般地都沒有模仿木結構的雕飾，僅有少數砌出斗拱模樣。例如山東長清靈岩寺辟支塔，位置在泰山北部的風景區。雖然用斗拱承托塔簷，也用斗拱承托平座，但總的說來，模仿木結構的部分僅此而已。這座塔的確年代無可考，從形式上判斷應當是十世紀末或是十一世紀初的建築。

另一個例子是河北定縣開元寺的磚塔，平面也是八角形，高十一層。它的內部如同靈岩寺塔一樣，都是用筒形券把樓梯、走廊、龕室砌出來的。這座塔建於公元1055年，是這時期華北廣大地區最典型的塔型。這座佛塔建造的動機是很有趣的。當時的定縣正在漢人的宋地區和契丹人的遼地區的分界線上，多年來宋遼都在進行着繼續不斷或斷而復起的戰爭。因此宋朝的漢族軍官就利用開元寺建造了這樣一座國境線上的佛塔，作為瞭望敵軍形勢的瞭望台。因此到今天當地的居民還叫這座塔做“料敵塔”。

與料敵塔約略同時的河南開封祐國寺塔（1041—1048年），從建築材料的發展上說，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在這座瘦而高的十三層磚塔上，全部使用琉璃面磚。這些面磚一共有二十八種标准塊。運用這些标准面磚可以砌出牆面、門窗、柱梁斗拱等等。這在材料技術方面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這些面磚是深赭色的，呈現鉄銹的顏色，因此這座塔一般被叫做“鉄塔”。當然，這種面磚不是突然出現的，在這樣運用以前，必然會經過相當的發展過程。在開封的繁塔（977年）上我們已經看到一座用标准面磚處理塔面裝飾的磚塔。雖然在這裡只用了一種模子壓出佛象的面磚和做“花邊”用的面磚。然而我們已經看到用标准面磚來處理磚塔外形的開始了。在這裡應該附帶指出，繁塔的平面是六角形的，是在八角形平面發展的同時一種派生的類型。河南濟源延慶寺塔（1036年）也屬於這一類型。

與此同時，在長江流域，雖然同樣在漢族統治之下，雖然佛塔的平面也都已經改用八角形，並且也是多層塔的形式，但是風格却迥然不同。在這一地區，特別是在長江下游一帶，磚石塔在材料和結構方法的許可下，盡量地模仿木結構的形式。最早的例子，

我們可以举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前的所謂双塔。这对塔事实上是用石料雕出来的塔的模式，高九层，实际高度不过十米左右。这一对塔是公元 960 年建造的。塔身的八个角上都刻出圓柱，上面刻出梁、斗拱、檐、瓦等等，完全和木結構的形式一样。这是这个地区这一塔型最早的例子。

这一类型的塔，在长江下游还保存着不少。它們都是用砖砌成的，内部也用砖砌出楼梯、走廊、龕室等。無論外部内部墙面的处理，都用砖砌出木构的形式；不过屋檐椽和平座部分往往也渗杂用些木料。砖砌部分全部抹灰，用彩色粉刷，給人的印象几乎同木結構沒有差别。但是由于檐椽是木結構的，因此后代大多损坏。这种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它的损坏后的形象也是最典型的。

苏州报恩寺塔、杭州六和塔和保椒塔都属于这一类型。但由于后代修理方法不同，就呈現了完全不同的三种形象。报恩寺塔是用后代（清朝）造檐的方式把檐补上的。因此可以說它最接近塔的原型，但是檐角飞翘比十世紀的制度翘得更高，所以乍看的形象是十七、八世紀的风格多于十世紀的风格。六和塔本来是一座七层塔，在十九世紀末年，当时的善男信女，在原塔身之外給它罩上了一层木結構的外衣，便做成十三层的模样。因此它就呈現一种肥而矮，但处理上又很纖弱的不知諧的形象。保椒塔連斗拱部分都损坏掉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修理的时候，就把一个类似八角柱型的塔身略加修补保存下来。因此，这三个塔虽然原来本是同一类型的，現在却变成三种完全不同的样子。

这一类型的塔保存得比較完整的是苏州罗汉院的双塔。这一对塔規模不大，高度由地到刹頂也不过二十米，斗拱和簷瓦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下来，給我們留下了这类塔型比較完整的形象。罗汉院双塔是公元 982 年建成的。

从第十世紀开始，北方的契丹族就逐步向南侵入，后来女真族又灭了契丹的統治者，先后建立了辽、金两朝，繼續向南方扩展。到了十二世紀二十年代，这两个北方民族就已經占有了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和汉族統治的宋朝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半。在这些北方民族統治的地区，佛塔虽然也都采取了八角形平面，但风格又和南方的塔很不相同。

在这里有必要特別叙述一下中国現存的一座唯一的木塔（第五图）。山西应县佛宮寺释迦塔，是 1056 年在契丹族統治之下建造的，由地面到刹尖高 66 米。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每层下面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累架的木框架結構，全部用傳統的柱、梁、斗拱层层叠上而建成的。除了塔基和第一层的牆壁是用砖石以及頂上的刹是鍛鉄之外，全部都是木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由下而上，由于每层的高度逐減，每层的宽度也逐漸收縮，特别是由于八角形的平面，为内部梁尾的交叉点造成相当复杂的結構問題。但是十一世紀中叶的伟大的不知名建筑师却运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圓滿地解决了这一复杂問題。后代的香客献給这座塔的一块匾上写着“鬼斧神工”四个字来歌頌这座神妙的結構是絲毫沒有誇大的。在九百年的长期間，这座金屬刹木結構的佛塔竟得幸免于雷电的破坏，一直保存到今天。它的木結構的穩固性是經過長時間考驗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的一次內战中，和在抗日期間，这座曾經受到一些輕微的損害。但在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这座塔立即受到保护。除了加固修繕外，并設置了

避雷設施。它將作為中國匠師在木結構上輝煌成就的典範，在今後若干世紀內，屹立在這個山西北部的原平上。

除了這個唯一的木塔之外，這時期中國北方保存到今天的佛塔全部都是磚造的。1090年前後建造的江北涿縣雙塔，成是橫仿應縣木塔的形式之磚塔。這兩座塔外表的處理上全部用磚砌出柱、梁、斗拱檣椽，但是由於材料本身的限制，出檣就比較短促，整個輪廓綫就是一個磚結構形式。此外，塔上每層八面中的四面所開的門是券門，因此，儘管它們是橫仿木結構的，但是沒有失去磚結構的特徵。從應縣木塔和涿縣雙塔的對比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建築材料對於建築形式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看到，材料的影響卻沒有影響到木塔和磚塔的共同風格。

在這時期，從現在河北省中部以北一直到遼寧、熱河等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塔型，那就是平面八角形，忠實地模仿木結構的密檣塔。上面已經提到，中國現存最古的磚塔就是嵩山嵩嶽寺第六世紀前半的密檣塔。在唐代，密檣塔採用了四方形的平面，它們都是用疊澀出檣的。並且在唐代塔身上也沒有砌出木結構的形式。但到了第十世紀，在這個契丹族統治的地區，匠師們却在八角平面上用木結構的柱梁和斗拱處理了塔身的外表；上面一層層的密檣，也全部用磚砌的斗拱承托，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塔型。1083年建造的北京天寧寺塔就是其中一個最傑出的典範。令人注意的事實是，在河北省中部以南，在這時期，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在漢族統治的地區，並沒有這種塔型。而在北方在契丹族統治地區卻為數甚多。我們從這一現象可以得出結論說，這一塔型是契丹族對於中國建築的一個偉大貢獻。同樣地，象涿縣雙塔那種形式的仿木結構多層塔也應該說是在契丹族統治下的匠師們的重要貢獻。



第五圖：公元1050年建造的應縣佛寺釋迦木塔

涿縣雙塔的类型在後代建造不多，但是天寧寺塔的类型却成為後代中國北部塔型中一個最常見的樣式。

此外，我們還有必要轉回到更南方在漢族統治下的福建和四川看幾個比較少見的例子。在福建泉州市的一雙石塔，是在公元十三世紀三、四十年代建造的。它們都是八角五層的塔，全部用石料構成，但是在石料的使用上不是傳統的運用壓砌的方法，而是把石料完全當做木材處理，用石頭的柱、梁、斗拱、檣、椽等構成一座塔。按照近代技術科學對於材料力學的理解，這種結構是極不合理的。值得我們驚訝的是，七百年來，這

两座塔依然屹立无恙，这是工程界一个罕见的现象。

此外，在四川宜宾县的白塔（公元 1102—1109 年）和洛阳的白马寺塔（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是两座保存了唐朝风格的正方形密檐砖塔。

从第十到十三世纪末年之间，中国的佛塔已经演变、发展、创造出许许多多的类型。虽然基本上是属于多层和密檐这两类，但是整体和细节的处理却是十分多样化的，不可能在这里详细介绍。

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在汉族居住的地区出现了西藏式的瓶形塔。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外国民族对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文化的贡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藏塔型是由蒙古族介绍到汉族地区来的。当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孙子忽必烈汗的领导下，正在企图征服全世界。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自己是崇奉佛教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他只进兵到长江以北，然后从中国的西北部征服了现在的青海和昌都地

区，然后沿着长江东下，最后消灭了汉族统治的南宋，并且定都于现在的北京，命名为大都。他这种迂迴战略，通过藏族地区，也就带来了藏族的文化和匠师，带来了喇嘛教。因此在 1271 年在北京城里，在一座辽塔的旧基上出现了一座高度在 70 公尺以上的西藏瓶形塔（第六图）。一直到今天，它还是北京城市轮廓线上一个极其突出的标志。从此以后，在中国全国各地出现了这一类型的塔。例如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塔（1577 年建），北京北海公园白塔（1651 年建），可以说都是北京这座白塔的子孫。这类塔型到了清朝，那就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各地出现的更多，在这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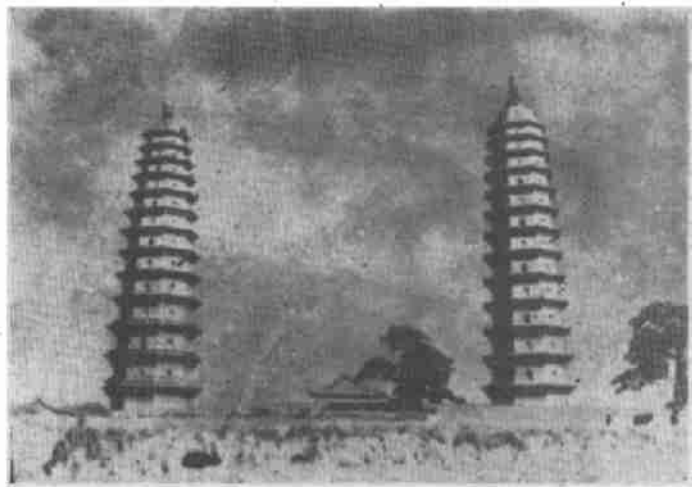
在一个曾经出家做和尚的农民的领导下，汉族人民经过长期间的战斗，在 1368 年把蒙古族的政权摧毁了。整个中国又回到汉族的统治之下，建立了明朝。1644



第六图：公元 1271 年建筑的北京妙应寺白塔

年，东北的满洲族又征服了汉族政权，1911 年中国又摧毁了满族政权，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这三个朝代中，在全国各地新建了无数的佛寺和佛塔。中国现存的佛塔大部分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在传统的塔型方面，一般地说来没有什么特殊地创造，絕大部分的塔都属于多层这一类型。在这五百多年之间，木结构建筑的斗拱比例和屋檐的深度都相对的缩小了，木结构的这种倾向也在砖塔上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个时期从比例上说，塔

身的每一層和斗拱塔檐對比就顯得高些；反過來斗拱塔檐就顯得象塔身上一圍周緣細的環帶，在總的輪廓綫上和十四世紀以前的塔，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的雙塔（十六世紀末期）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七圖）。此外，北京玉泉山塔（十八世紀）也是一個典範。



第七圖：公元十六世紀末期建造的太原永祚寺雙塔

在八角密檐塔方面，雖然這期間建造的也為數不少，但大多數不很大的

高僧的墓塔。重要的例子只有一個，那就是北京八里莊慈壽寺塔。這個塔是 1578 年建成的，在形式上它完全模仿第十世紀末年的天寧寺塔；但是從建築處理的細節上看卻完全用的是明朝的制度。

山西洪趙縣廣勝寺的飛虹塔，值得作為一個突出的範例提出。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河南開封第十世紀中葉的全部用赭色琉璃面磚的所謂鐵塔。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看見了一座在磚塔上大量鑲砌彩色琉璃面磚作為建築裝飾的佛塔。這座八角形的塔共高三十三層，高度在 40 米以上。每層塔身的柱、梁、斗拱檐椽等等都用琉璃磚瓦做砌。磚牆壁上也鑲嵌了大量的琉璃佛像和裝飾花紋，外觀至為華麗。塔的輪廓綫不是象其他的塔向上每層逐漸增加縮小的尺度而呈現曲綫型，而是直綫的，因此呈現一個八角錐體型，顯得有一點生硬。塔內最下層供極大的釋迦坐象一尊，以上各層事實上是實心的，但內部有梯可達塔的上部。這座塔是在 1417 年興建的，但琉璃面磚上多有 1515 年的標志。由此看來，這座由動工到完成可能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時間。

現在在北京頤和園、玉泉山和香山一帶還有幾座清朝（大約屬於十八世紀）的琉璃塔。在使用琉璃方面就不是和磚壁并用，而是全部用琉璃的。其中頤和園和玉泉山的塔，都是很小的，只能說是一座大塔的模式。

在十五世紀後半，在中國的土地上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塔型。這是藏族人民對於中國建築的又一重要貢獻。在十五世紀前半，西藏喇嘛班迪達來到北京，貢獻了一尊金佛像。當時的皇帝為它建了一個寺。到 1473 年，皇帝下詔在寺內按照中印度的形式建了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一個长方形的高台上，建立五座塔。這五座塔是正方形平面的密檐塔。我們推測，這座塔是模仿佛陀伽耶的部署而設計的。在雲南昆明妙湛寺也有一座金剛寶座塔，比北京的這一座略早十年，從年代上說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座金剛寶座塔。昆明的這座塔比北京的這一座規模小得多，上面的五個塔都是西藏式的瓶形塔。從昆明這座塔上也可以看到這一塔型傳入中國的來龍去脈了。

現存最大的一座金剛宝座塔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在上文已經提到。碧云寺塔上面不是五



第八圖：公元1980年建造的北京佛牙舍利塔

座而是七座塔，其中五座是密檐塔，兩座是喇嘛式的瓶形塔，是1747年建成的。在1929年這座塔被改用於中國民族革命的先行者或孫中山博士的衣冠塚。在滿洲族統治期間，這一類型的塔還在許多地方建造起來。其中還應該提到北京黃寺的金剛宝座塔，是班禪三世的墓塔（1779年入寂），全部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雕刻異常精美。由於金色寶頂和它下面垂下兩片巨大的塔耳。因此呈現了非常特殊的形象，形成了它獨有的風格。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一宝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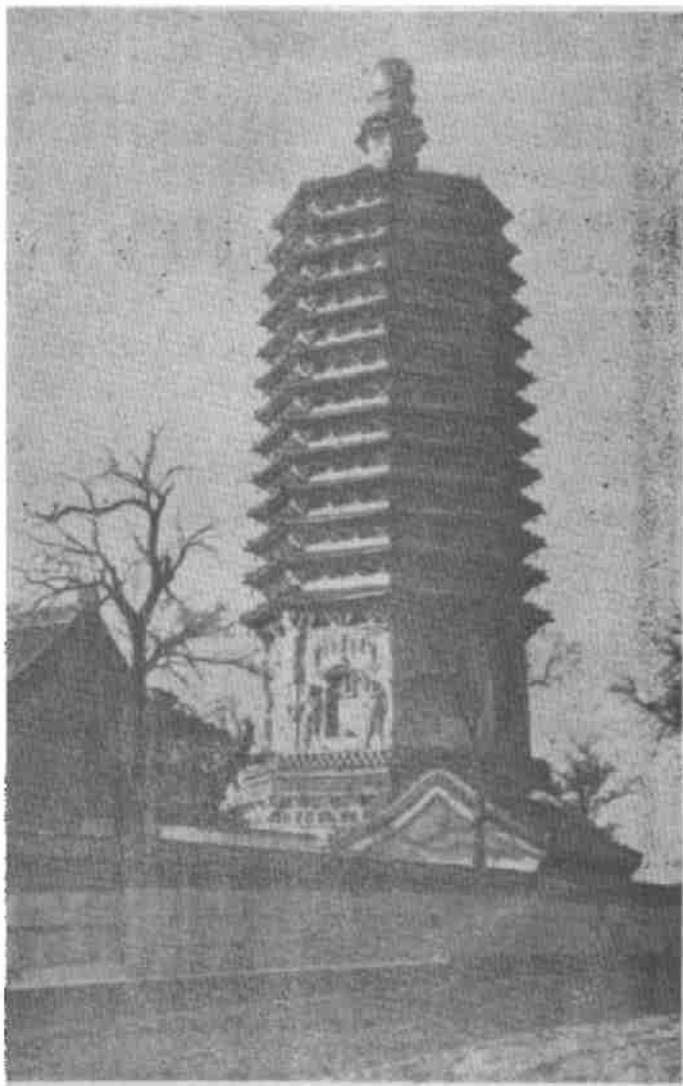
正中主塔是一座喇嘛式瓶形塔，而四角的小塔卻採用漢族傳統的八角塔的形式，在比例上也相對地顯得很小，從而更突出了主塔的重要性。

在這五百多年期間，在中國的土地上，還出現了另外一種塔，在形式上和佛塔沒有區別，但它是一種非宗教的塔，也可以說是一種儒教的塔——假使我們也可以說儒教是一種宗教的話。它是在過去科舉時代為了祈求本地的文人能夠在國家考試中及第，作為一種能夠發生巫術力量的紀念性建築物而建造的。這種塔雖然不是佛教塔，但作為一種類型，它是以佛塔為藍本而建造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佛教以及佛教建築對於中國人民

生活的影響。

到了十九世紀以後，中國建造的佛塔是越來越少了。然而在1960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十年以後，在人民中國首都附近的西山靈光寺，又建起了一座新的佛塔（第八圖）。這座佛塔是由人民政府為了佛教徒們供奉著名的佛牙而建造的。在這裡有必要追述一下這座塔的前身的命運。

在靈光寺西面原來有一座遼朝建造的磚塔（第九圖），但在1900年英、法、德、意、奧、俄、日、美八個帝國主義的侵略聯軍佔領了當時大清帝國的首都北京，那座十一世紀的塔被毀壞了。殘破的塔基在這個北京近郊的風景區供人凭吊，歷六十年之久。現在全中國的佛教徒以無比興奮的心情看到了這座新塔的湧現。塔的位置，距離殘留的塔基約一百米。在形式上雖然還是參照原塔的形象，但是新中國的建築師在佛教徒的建議下，採用了近代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建成這座八角十三層，高15米的密檐塔。在內部空間的利用和文物的保存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創造，是在傳統的基礎上革新、創造的一個很好的典型。塔頂上金光燦爛的塔刹是按照1957年中趙朴初居士從錫蘭得到的一座小銅塔的形式塑造的。在這座塔上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偉大的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它將



第九圖：公元十一世紀建造的北京靈光寺西面的磚塔

作為一個輝煌燦爛的標志在今後幾十個世紀中屹立在北京近郊的這個風景區里。可以附帶提到，舊塔的殘基也由人民政府很好地保存下來作為歷史中兩個時代的鮮明對比。

## 佛教建筑是我們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在中国人民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佛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思想意識方面，許多佛教教义已經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在語言、文字、詩詞、繪画、雕刻和日用工艺品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响。这一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更具体地从建筑中表現出来。从建筑的历史观点說来，我們應該感謝佛教給中国的建筑带来了一个新的类型。虽然說最早的佛寺是按照世俗建筑的形式，或者就是用世俗原有的建筑来满足佛教的宗教生活的需要的。但是反过来佛教建筑又給中国的世俗建筑提供了一些新的部署和处理方法。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建筑和世俗建筑彼此影响，也促进了中国建筑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建筑的出現，在古代的城市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城市面貌，丰富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不仅城市如此，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在山林深处，在河流岸边乃至在广阔的原野上，佛寺不但丰富了中国的风景，不但給信徒提供了修养的环境，也給广大人民从文学家、詩人、画家，一直到簡朴善良的农民，提供了幽雅的休息地方。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貢獻是巨大的。上面所提到的塔、寺更是一份丰富多采極其可貴的遺產。象一顆顆燦爛宝石一样，它們点綴着中国的錦綉河山。無論在鉄路上、公路上、水路上，我們都可以不时不时地看見处处突出的一个塔尖和在下面衬托着它的寺院殿堂，或是近处巍峨的高聳云霄的塔影。这些已經成为中国风景輪廓綫上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了。

在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家具、裝飾等等小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由于佛教传入中国而带来的許多裝飾紋样。

进入十九世紀以后，新建佛寺的活动就越来越少了，反映着佛教在中国已經逐漸衰退，原有的寺院已足够为数还是不少的佛教徒的宗教生活的要求。但是不少的寺院也逐漸頹圯或被破坏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坚决貫徹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真正的保証；一个多世紀以来失修的寺塔，也由人民政策选择其中为佛教徒的宗教生活所需要的以及具有重大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的，予以史无前例的科学的、慎重的重修，使它們作为民族的珍貴遺產长久地屹立在本民族的土地上。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他們新的城市和农村。中国的建筑师們得到了史无前例地发展他們的才能的机会，新的材料技术給他們提供了在創作上更大的可能性。他們在运用新材料、新技术的时候絕不会忘記一个民族的新建筑，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必須是从他們的旧文化、旧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个旧建筑的珍貴傳統中，佛教以及佛教建筑也有很大的一份貢獻。

## БУДДИЙ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ИТАЯ

### РЕЗЮМЕ

*Лян Сы-чэн*

Стать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нтерес в основном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читателей, верящих будизму, и является кратки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изложением о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буддий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Китая со времени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буддизма в Китай вплоть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посл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татья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анализа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корня буддий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ран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и затем освещается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дл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буддизма в период двух династий Цзинь (两晋) и Эпохи юж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династий (南北朝), и состояние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храмов и пагод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на облик городов и жизнь город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и выясняется, что та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ак храмы и пагоды, также не может отделена от условий, созда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ой страны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чиная с сооружения пещерных храмов, статья показывает Дуньхуан (敦煌), Юньган (云岗), Лунмэнь (龙门), Тяньлуншань (天龙山), Сянтаншань (响堂山) и другие пещерные храмы. Далее в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как они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Индии и как становятся пещерными храмам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после их твор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Китае. Здесь автор также подчеркнул, что все эти пещерные храмы были ограблены и разрушены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и и заставляя повысить бдительность тех стра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имеющих богат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Вслед за этим, в статье приведён ряд отдельных храмовых залов и палат с позднего периода Тан (唐) (например) храмы Наньчансы (南禅寺) и фогуньсы (佛光寺) до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清), и буддийских монастырей династий Ляо (辽), Сун (宋), Цзинь (金), Юань (元), Мин (明) и Цин (清), кратко анализированы их композиц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лана,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приемы, а также и полити-

че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факторы, оказывающи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Буддийская пагода выясняется, как один из выдающихся типов в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В статье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как индийская пагода был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а с китайской оригинальной деревянной конструкцией многоэтаж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и рождение нового типа пагоды, ее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звитие в течение тысячи лет истории, процесс перерастания деревянной пагоды в каменную, а также и кратко 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о влияние новых строитель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техник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ее конструкцию, тип и стиль.

В статье отмечен большой вклад, сдела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ями Магольской (蒙古族) Тибетской (藏族), древних Кидани (契丹) и Чжурджэни (女真), и других, на создание типов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емов буддийской пагоды.

Наконец, приводя пример пагоды Фоята (佛牙塔) в храме Лигуансы (灵光寺) в Пекине, автор объясняет мудрость и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зложении некоторых важ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оказана забота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 памятниках буддий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статьи автор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буддий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ак часть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будет делать большо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нового Китая.